



# 教学与研究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 批判主义理论的复兴

——全球化视角下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研究述评

张 皓，杨伟国

JYYWP2024032

2024. 4. 3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  
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 批判主义理论的复兴

——全球化视角下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研究述评\*

张 皓，杨伟国

**[关键词]** 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数字劳动；批判主义；劳动关系

**[摘 要]**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肇始之基是国际范围内政治经济领域的除旧布新——旧的以国家疆域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式微，多极化国际政治新格局的出现，以及自由化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这些变化系统性地挑战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消费主义—福特制大生产—工会主义—福利国家”这一逻辑链条为基础所建立的相对稳定的产业/劳动关系系统。在西方劳动关系领域，主流的多元主义理论范式因此面临艰难转型。而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批判主义范式则迎来了全新的历史机遇，相较于多元主义对新时期的劳动关系问题表现出了更强的解释力。具体来说，随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者再次看到了全球范围内挑战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曙光；而微观视角的剩余价值理论则通过对算法控制和数字劳动的深刻洞察而重获其对数字化生产组织方式的解释力。通过对上述两个理论流派最新思想的评述，本文得出结论：在对全球化时代劳动关系领域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论争上，理论界正在见证批判主义的复兴。文末还对上述理论对新时期构建中国劳动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和解释中国劳动关系问题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作者简介]** 张皓，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杨伟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教授（北京 100101）。

肇始于 20 世纪后半叶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甚巨，重构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战后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权力平衡。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其对全球化历史进程的批判性考察中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全球化代表着“空间”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直接参与到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即资本的空间调整（spatial fix）。<sup>①</sup> 资本得以通过对空间的重构策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一带一路’国家劳动与雇佣管制研究”（项目号：17ZDA041）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Harvey, David, “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 und Diskussion*, 2001, 3 (2): 23 - 30.

略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这是由于空间赋予了流动性更高的资本要素远高于对于劳动力要素的谈判优势<sup>①</sup>——即资本的空间转移不论从技术、制度还是文化层面都成本更低且更具灵活性。与物理空间的重构过程相伴随，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还深刻嵌入着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两条线索，这被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Silver）总结为资本的技术调整（technological fix）和金融调整（financial fix）策略。<sup>②</sup>

在产业/劳动关系领域，全球化、数字化和金融化不但为政策制定和工会运动提供了崭新而深刻的背景，同时也为领域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化视角，对传统的产业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主要表现在资本的跨国流动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生产成本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从而给发达国家带来大规模生产转移和工作岗位流失，而工会的式微和边缘化则在发展中国家引发了不断恶化的工作环境和被侵蚀的劳动者权益。数字化平台和算法管理技术的发展在虚拟网络空间内进一步重构了生产过程，升级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同时扩展了资本攫取剩余价值、实现积累的空间边界。而金融资本的崛起则意味着劳资关系距离的延伸和模糊化，即“资本从贸易和生产中完全转移出来，而投入到金融投机过程之中”，从而避免作为雇主直接参与到劳动力的使用和管理之中。<sup>③</sup> 这些新的情境在全球范围内重塑了劳资关系，其所带来的新的劳动关系现象和问题也亟须相关理论的升级给予解释。

批判主义（critical theory 或 radical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是劳动关系领域最重要的两个研究范式，也分别代表了产业关系领域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最主要的理论阵营。“冷战”结束之后，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批判主义理论似乎在世界范围内失去吸引力，而抱持制度改良的多元主义视角则越发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青睐。20 世纪末至今，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全面来临，这两个理论流派同时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多元主义随着其所根植的福特制大生产（Fordist mass production）模式的式微而面临发展瓶颈，而批判主义则凭借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制度洞若观火的解释力而获得了重生。本文首先简介了这两个劳动关系理论范式的基本假设和论争，进而评述了全球化时代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为代表的批判主义劳动关系范式的最新发展，从而支撑了这一结论。文末还对全球化和“一带一路”语境下，上述理论对解释中国劳动关系问题、构建中国劳动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

## 一、批判主义和多元主义历史之争

多元主义和批判主义的理论分野发源于其截然不同的劳动价值观，即两个范式对于劳动力和劳资关系的原始假设的不同带来了其关注的核心劳动关系问题以及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的差异，这些差异被总结在了表 1 中。如其所示，虽然两个范式都关注到了劳动力超越一般商品的特殊属性，但是其劳动观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

<sup>①</sup> Palley, T. I., “Capital Mobility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Prosperity”, *Challenge*, 1994, 37 (6): 31-39.

<sup>②③</sup> Silver, Beverly J.,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0.

表 1 批判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理论基础与全球化时代的研究视角

理论流派		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	多元主义/制度主义
理论 基础 与基 本假设	劳动观	劳动力不仅是商品，劳动者有阶级权利	劳动力不仅是商品，劳动者有道德价值和参与权利
	劳资关系观	劳资冲突内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不可消失也无法从根本上调和	劳资冲突仅限于劳动关系之内，并且可以通过民主参与和谈判来协商一致达成妥协
	核心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定，劳资阶级妥协是如何被建构和反建构的？	劳资阶级妥协既定，劳动关系制度如何被多元利益主体塑造？
	社会财富分配方式	零和分配：表达为工作场所内外的激烈而广泛的劳资对抗乃至革命	力量博弈式分配：表达为社会政策或不同层次上的劳资契约
	管理技术手段	严密的劳动过程控制和规训，压制工人组织	员工参与、工会和集体谈判、产业民主
对全 球化 的核 心观点	宏观视角	全球治理层面/历史唯物主义： 全球化为瓦解国家层面的劳资阶级妥协提供了机遇	国家治理层面/系统理论： 全球化时代，国家制度仍然是塑造产业关系系统多样性的主要解释变量
	微观视角	工作场所层面/剩余价值理论： 阶级妥协和“同意”的塑造蕴含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生产过程之中，劳动者和消费者都被卷入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中	行动主体层面/工会主义： 工会是塑造国际产业关系系统最重要的能动主体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评述整理，对 Befort & Budd<sup>①</sup> 的相关论述亦有参考。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世界不断涌现诸多劳工问题，西方国家因此开始了一系列的内部改革，这包括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在劳动关系场域内对工会和集体谈判制度的广泛认可——无论是通过美式的立法形式，还是通过英式的“自愿主义”（voluntarism）形式。而西方学术界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赤化危机”，也开始同批判主义阵营针对一系列重要的劳动关系问题展开了论争，并因此建立了奉行改良主义的劳动关系学派。在学科建设上，1920 年，制度学派（intuitionism）的主要奠基人、劳动关系学科在美国的创始人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劳动关系学专业。在理论建构上，则涌现了以系统理论和工会主义为代表的——一大批多元主义学说思想。

多元主义范式基于一个社会治理的假设，即社会由多元乃至彼此冲突的利益诉求构成，而各利益主体通过寻找或组织代理人表达声音，并在面对共同关心的议题上进行谈判和协调，最终产出制度和规则，用以反过来建构（而不是革命）系统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元主义者全心拥抱制度主义改良。多元主义既不像统合主义（corporatism）追求通过国家给予统合性组织垄断性的代表权来实现各方利益主体最终的协调一致<sup>②</sup>，也不像批判主义认为利益的差异根源于系统性问题因而不可调和，而是提倡基于私人治理（private governance）的利益协调，即允许不同利益群体通过表达诉求、组织联盟、开展社会运动（通常限定在经济议题范围之内）以及妥协谈判来实现社会治理。因此，如

<sup>①</sup> Befort, Stephen, and John Budd, *Invisible Hands, Invisible Objectives: Bringing Workplace Law and Public Policy into Focu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8 - 14.

<sup>②</sup> Schmitter, P. C.,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Review of Politics*, 1974, 36 (1): 85 - 131.

果说战后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仍然大致保持了统合主义传统的话，那么以英美为代表的所谓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国家则全心拥抱了多元主义的制度范式。而多元主义的产业关系学科范式正是在后者起源并得到了广泛盛行。

在劳动关系问题上，如表 1 所示，多元主义同批判主义一样关注劳动力超越一般商品的属性，但是侧重于劳动者作为人的道德价值和参与权利。其中道德价值指人对于提升他人及社会的总福祉所具有的价值，带有一定的利他主义色彩。多元主义认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必然存在的劳资利益冲突，但是并不认可这种冲突的根源是剩余价值的非法占有。因此，劳资冲突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内实现协调和解决，而解决方案即为赋予劳动者以参与特别是集体参与工资决定及其他企业管理决策的权利，其核心的制度设计即为工会和集体谈判制度（在德国等部分国家或表现为以“共决制”为代表的、赋予劳动者更高参与度和决策权的产业民主制度）。多元主义认为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案必须通过这种集体谈判的形式才能真正实现，这是因为普通劳动者只有通过团结才能增强自身的谈判力量。而这种力量博弈的产出仅为社会政策或者不同层次上的劳资契约，并不输出革命。

与此相对应，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劳动力创造价值”的经典假设，批判主义关注劳动力作为阶级形式的存在是如何被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沦为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的。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这一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终将带来劳工阶级的觉醒和反抗。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劳资冲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由于资本不直接创造价值，劳资之间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只会带来尖锐的“零和”斗争而难言公平。因此，资本家为了维持现有生产关系必须采取严密的劳动过程控制手段，同时压制工人组织。<sup>①</sup> 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经典劳动价值理论的指导下，批判主义范式在劳动关系研究中所回应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阶级妥协和从属是如何被建构和反建构的。

两个理论流派由于其劳动价值观等基础假设的不同，因此在战后经历了重大的历史争论，在对生产和劳动关系的解释，分配问题和劳资冲突解决方案，以及阶级妥协和社会契约的建构等方面都发展出了差异巨大的观点和理论体系。总体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基于奉行制度改良的多元主义理论构建了其主流的劳动关系治理体系，支撑了战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黄金时代”的稳定发展，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却遭遇了瓶颈。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生产的空间重构使得资本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收割剩余价值，从而一定程度上架空了以国家制度为基础建立的国家产业关系系统；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型带来了工会影响力的式微。这些变化对以产业关系系统理论和工会主义为核心的多元主义产业关系理论范式带来了重要挑战。<sup>②</sup>

## 二、批判主义的复兴

在全球化时代，批判主义劳动关系理论有关劳资阶级妥协的建构和反建构的关注被聚焦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加以考察：在全球治理层面，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论争中发现全球化为瓦解国家层面的劳资阶级妥协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工作场所层面，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则揭示了全球化和数字化的生产过程如何重塑了阶级妥协和“同意”的生产过程，同时扩展了资本通过剥削实现积累的空间边界。本节从这两个视角出发，评述批判主义劳动关系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过程及其

<sup>①</sup> Marx, Karl, *Capital*, Volume I, Fowkes, Ben (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sup>②</sup> 有关多元主义经典理论及其所遭遇的历史挑战的评述参见：杨伟国、周宁：《西方比较产业关系理论：发展与挑战》，《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7期。

所迎来的复兴机遇。

### (一) 历史唯物主义及“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论争

由于其“批判性科学”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下的理论升级也主要通过反思全球化主义者和反全球化主义者两派之间的论争所实现。全球化主义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家的力量被侵蚀并逐渐让位于资本，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笔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霸权从而演变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霸权。而反全球化主义者对全球化的批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则沦为向资本主义霸权的妥协。与两派都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者在全球化时代看到了机遇，认为当全球化的浪潮系统性地挑战了旧的国家本位的生产模式时，也一并削弱了战后资本主义霸权体系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而全球化的进程又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同步创造出与资本所对应的、作为阶级妥协参与者的工人阶级集团，那么，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霸权体系的计划就将遭遇挫折。因此，迈克尔·布若维（Michael Burawoy）在论证马克思主义之科学性时充满自信地预言，由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动力提供了一个十分丰富的解释，当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优势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将再一次地广为盛行。<sup>①</sup>

全球化论战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分割成两个阶段：经济国家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国家主义阶段以强调政府干预、通过提高收入、拉动消费的需求侧改革来提振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实现了战后以欧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短暂繁荣，即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的资本主义“黄金年代”。图 1 简略地展示了这一繁荣时期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劳动关系治理逻辑。如图所示，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完善并制度化了两类分配制度：其一是工会和集体谈判制度。以美国为例，凯恩斯主义在劳动关系治理领域表现为“罗斯福新政”模式，其核心特征即工会和集体谈判实践的全面合法化和制度化。北美地区的集体谈判结构体现为更加分散化的、企业层面的劳资谈判模式，辅以有限的行业内和行业间协调。在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更加中心化的社会对话机制（包括劳资政三方）、行业工会和工资谈判，以及深度政治参与的工会和工党联盟模式则拥有相对更长的发展历史。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还在这一时期普遍建立起了完备的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福利国家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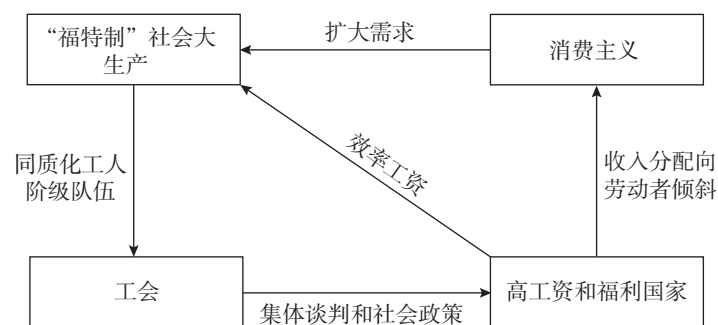


图 1 战后西方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劳动关系治理逻辑

这些制度的形成构成了劳资阶级对话和阶级妥协的政治经济基础，其所形成的重要的社会契约使西方社会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成功避免了“赤化危机”，也在劳动关系学术领域支撑了多元主义作为主流理论范式的发展。这是因为工会和集体谈判作为彼时核心的工资决定机制，使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劳动者倾斜。高速的工资增长一方面在工作场所形成了“绩效工资”的效应，即通过提高工资

<sup>①</sup> Burawoy, M., “Marxism as Science: Historical Challenges and Theoretical Grow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0, 55 (6): 775 - 793.

和人力资本投入来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消费主义扩大了市场需求，从而为强调标准化大生产的“福特制”模式提供了稳定的市场空间。社会化大生产同时孕育了一支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这些同质化和去技能化的工人意识到只有通过团结才能产生足以对抗资本的劳动力市场议价权，这反过来又构成了工会与集体谈判蓬勃发展的社会基础。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面临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在政治决策中随即被边缘化，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全球化进程开始大行其道。对于全球化主义者来说，全球化是在国际范围内抵制国家干预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倡导市场的自我规制的一种新自由主义策略。他们相信市场在国家不干预的情形下可以最好地运行；国家干预通过保护主义限制了私人的创新、扼杀经济的发展，最终将毁灭资产阶级的“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sup>①</sup> 全球化不仅体现了资本与生俱来的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能力，同时也体现了其超越国家边界，追逐最优的直接获取经济收益的条件以及最大可能的边际效益的能力。<sup>②</sup> 从而，国家被认为不再能够全面而连贯地规制其经济，个别国家无法控制其自身经济的未来，政治也因此无法提高全体国民的境遇，凯恩斯主义下的完全就业和全面的福利也无法通过国家政治实现。一句话就是国家的自治权在全球化下受到了一定的限制。<sup>③</sup>

反全球化主义者则仍深刻秉承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国家规制的观点。认为：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无法保障自由的经济不沦为自我毁灭，也就是他们预言的由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规制的危机（regulative crisis），即政治对资本的规制的危机。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带来了工人阶级的薪资增长停滞甚至失业，无法实现技能升级的工人大量流向服务业，并屈就于更低的劳动条件和愈发不稳定的雇佣关系。这种重构的中产阶级的职业身份使基于产业工人队伍所建构的工人阶级团结越发失去吸引力，工会和集体谈判制度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式微<sup>④</sup>，伴随着整体公共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逐步拉大。与此同时，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几次经济危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结构恶化，政府税收基础不断流失，特别是在西欧部分国家，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无力支撑其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体系。<sup>⑤</sup> 这种危机意味着前述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契约的解体，多元主义劳动关系理论体系中的“民主政府”难以维持大众的福祉，从而进一步丧失了其合法性基础。

总体而言，在反全球化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国家的力量被侵蚀并逐渐让位于资本；葛兰西笔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领导权从而演变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领导权。因此，反全球化主义者批判以自由竞争为主流的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倡导规制的改革。<sup>⑥</sup> 然而，这种规制的改革并不是当然的国家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力量需要在国家或者国际层面创造新的政治规

---

① James, H., *The End of Globalis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Hirsch, J., “Globalisation of Capital, Nation-states and Democracy”,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1997, 54 (1): 39 - 58.

③ Held, D., *Democracy and Glob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95, pp. 108 - 113.

④ Katz, Harry,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93, 47 (1): 3 - 22.

⑤ 有关 20 世纪 70 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面临的治理危机和福利国家体系所面临的挑战的一个比较全面的综述见：Brady, David, Jason Beckfield, and Martin Seeleib-Kais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Affluent Democracies, 1975—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5, 70 (6): 921 - 948, 作者还对这一危机是否以及如何被全球化进程所解释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证据和讨论。

⑥ Bonefeld, W., “Globalisation: Crisis of Regulation or Crisis of Capital?”, June 2, 2019, <http://www.rci.net/globalizacion/2002/fg255.htm>.

制形式——从反全球化角度，应该提升国家作为实施经济规制的代理人<sup>①</sup>；从世界民主的角度，则应该是一种适合于新的积累阶段（即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性积累和金融积累）的规制形式<sup>②</sup>。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过分强调其对经济规律的洞察力以及指导现代国家机构规制经济的能力，却恰恰是通过对所有诸如此类议题的否定而实现的。<sup>③</sup>对于同样挥舞反资本主义大旗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反全球化主义者的“反资本主义”的本质却值得怀疑。现阶段的以反全球化为主要形式的“反资本主义”存在着内生的矛盾：他们虽然看到资本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但是认为这种危机的解决仍然在资本主义内部，他们因此寻求以规制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即强调重构资本主义社会契约，却对动摇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或者说革命，亦即是人类的解放漠不关心。他们对全球化的批判将最终失败，因为他们并不批判以社会再生产为基本构成的资本主义模式。<sup>④</sup>

马克思主义者还批评部分反全球化主义者对国家保护主义的倡导，认为：如果他们对全球化的批判一味地沦为了以保存既有国家形式为基础的解决方案，那么他们实际上最终妥协于最反动的力量。<sup>⑤</sup>换句话说，反全球化主义者对全球化的批评或将沦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领导权的妥协。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对国际主义，他们认为反全球化主义者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其以国家主义的复苏为名义而放弃了国际主义路线。<sup>⑥</sup>可以说，在国际观上，马克思主义同反全球化主义的主流路径相反。

因此，如果说在全球化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妥协体现了一个资本主义霸权已然形成的历史格局，那么，全球化的进程则恰恰提供了一个削弱这种阶级妥协的契机——资本积极尝试在全球层面重建其文化领导权时遭遇了困难，这是因为全球范围内劳动的弱势地位使得工人阶级无法作为一个从属性的行动者被整合进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历史集团（historic bloc）<sup>⑦</sup>，即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霸权体系。换句话说，既然资本并不能脱离于劳动而“独步天下”，而全球化的进程又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形塑出与资本所对应的、作为阶级妥协参与者的工人阶级集团，那么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文化领导权体系的计划必将遭遇挫折，随之而来的则是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契机。

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资本对空间优势的攫取又更近了一步。从本质上来说，从生产型资本到投机资本的转变使得资本可以不直接雇佣工人和处理劳资关系问题，而是通过将此类风险转嫁给被投资企业，并在这些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实现积累。在劳动关系领域，对全球化的批评因此常常伴随着对金融资本和全球金融化的批评。一个核心的主线是金融资本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经典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区分了耐心资本和不耐烦资本的概念。前者指银行等为企业提供长期信贷，相对长远地关注企业成长能力的传统金融资本；而后者则为以股票市场、私募基

① Panitch, L., “Globalisation and the State”, *Socialist Register*, 1994, (30): 60-93; Panitch, L., “The New Imperial State”, *New Left Review*, March/April, 2000.

② Held, *Democracy and Global Order*, Polity, 1995, pp. 267-386.

③ Marcuse, H., *Vernunft und Revolution*, Luchterhand, 1979, p. 242.

④⑤ Bonfeld, “Globalisation: Crisis of Regulation or Crisis of Capital?”, June 2, 2019, <http://www.rcci.net/globalizacion/2002/fg255.htm>.

⑥ Clarke, S., Class Struggle and the Global Over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 R. Albritton, M. Itoh, R. Westra, and A. Zuege, eds,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algrave, 2001, Ch. 5.

⑦ Lillie, N., “Globalization and Class Analysis: Prospects for Labour Movement Influence in Global Governance”, *Industrielle Beziehungen*, 2006, 13 (3): 223-237.



金、风险投资等为代表的新型金融资本。<sup>①</sup> 在全球化时代，不耐心的资本由于其受到国家和国际制度监管的约束相对于银行业更小，以及其本身的风险偏好等因素，更容易打破地理空间的局限，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收割剩余价值。而资本也被这种潜在的高收益和全球层面的积累机遇所吸引，越来越多地从传统金融部门涌向新兴市场。

这种投机主义带来了被投企业的“短期主义”（short-termism）问题。全球金融资本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强烈的“不耐心”折射为工作场所中短期化、功利化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关系战略目标。<sup>②</sup> 在一项经典的对于私募基金的研究中，学者发现私募在组合投资企业时通常会大量引入债务，这迫使作为最终债务人的被投资企业采用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增加现金流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缩减工资福利，通过大规模的裁员、劳务外包、策略性破产等方式降低劳动力成本等。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和收入的极大不稳定，威胁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sup>③</sup>

当反全球化主义者及部分多元主义者批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国际资本投机的纵容时，马克思主义者则警告这些批评可能面临的危险，有时甚至将其与纳粹主义进行对比。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批判而片面地指责投机资本，亦即是批判全球金融积累（monetary accumulation）却妥协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性积累（productive accumulation），与纳粹主义（对工业生产的盛赞而将金融产业视为“吸血鬼”）无异。<sup>④</sup> 事实上，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性积累的危机导致了金融积累从生产性积累中脱颖而出。<sup>⑤</sup> 这一批评带有浓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色彩，即高度聚焦于生产性劳动实践和生产性积累中的核心矛盾，而对于任何有可能模糊这一焦点的讨论（无论其是有意或是无意的）都持审慎态度。

总的来说，深刻秉持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全球化中看到的不仅是挑战，更是一种机遇。<sup>⑥</sup> 因为资本永远依赖于劳动，劳动是资本合法化的前提条件——资本需要从工人中榨取剩余劳动从而保证其作为资本的存在——这是资本与生俱来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永远“跑不掉”——即使在全球化的诸多表征中更多被看到的是资本在区域间的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自由转移，然而就其本质而言，资本永远无法完全“自由于”劳动之外。<sup>⑦</sup>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批评带有充分的辩证性。西尔弗对世界工人运动史的考察深刻印证了这一点：虽然金融调整的策略可能在特定历史时期同式微的工人运动具有一定关联，但究其本质而言，劳资冲突仅仅在资本

---

① Hall, Peter A., and David W. Soskice,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Peter A. Hall, and David W.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 - 68.

② Gospel, Howard, and Andrew Pendleton, "Fin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Management of Labour: A Conceptu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3, 41 (3): 557 - 582.

③ Appelbaum, Eileen, and Rosemary Batt, *Private Equity at Work: When Wall Street Manages Main Street*,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4, p. 42.

④ Bonefeld, "Globalisation: Crisis of Regulation or Crisis of Capital?", June 2, 2019, <http://www.rcci.net/globalizacion/2002/fg255.htm>.

⑤ Bonefeld, W. *Monetarism and Crisis*. In W. Bonefeld and J. Holloway (eds.), *Global Capital, National State and the Politics of Money*, Macmillan, 1995, pp. 35 - 68.

⑥ 参见理查德·海曼：《劳资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原著作者在中译本出版时所作《致中国读者》。

⑦ Bonefeld, W., The Spectre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World Market, In: W. Bonefeld & K. Psychopedis, eds, *The Politics of Change: Globalization, Ideology and Critique*, Houndmills: Palgrave, 2000, Ch. 3.

的内部实现了转移<sup>①</sup>，结构性的阶级矛盾本身从未也永远不会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消失。

## （二）剩余价值理论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的深刻洞察还体现在其对工作场所层面的批判性分析，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攫取过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剩余价值是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即为再生产其劳动力价值所工作的时间）之外创造的、被资本家所掩盖和攫取的、超越劳动报酬之外的“无偿”劳动所创造的价值。<sup>②</sup>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继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之后的又一重大创见，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理论，也是批判主义劳动关系范式发展的起点。

全球化时代学术界对这一部分理论的重要拓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剩余价值的创造、掩盖和阶级“同意”过程的关注。随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劳动过程理论成为微观层面劳动关系研究的主流，被用于解释阶级妥协和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形成的组织和技术基础。关于劳动过程理论的相关述评类文章多见于中文世界<sup>③</sup>，这里不再赘述。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总结了劳动过程理论关注的四个关键要素：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功能性角色、工人的技能、资本为实现并扩大剩余价值而对劳动过程所实施的控制手段，以及工人的主体性即反抗或者同意的塑造过程<sup>④</sup>，这些要素构成了当代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分析框架。

劳动过程理论自 20 世纪以来迎来了两次重要的发展机遇。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方兴未艾的 20 世纪 70 年代，劳动过程理论在哈利·布雷夫曼（Harry Braverman）<sup>⑤</sup>、迈克尔·布若维<sup>⑥</sup>、保罗·汤普森<sup>⑦</sup>和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sup>⑧</sup> 等人的推动下，掀起了工业社会学的第一次复兴浪潮。彼时的研究着重于对嵌入在国家制度情境内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模式的分析和解构上。虽然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有一些预见性的讨论<sup>⑨</sup>，但是数量不多且不够系统。进入新世纪，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掀起了工业社会学和劳动过程理论的第二次复兴。在劳动关系领域，数字技术重构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劳动力要素实现生产过程的方式，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资本得以摆脱依附于福特制社会化大生产模式下基于雇佣组织的生产过程安排，实现平台化的劳动用工管理。这种变化对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和劳工保护制度框架，即罗斯福“新政”（New Deal）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基于标准劳动关系所构建起来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雇佣保护制度、工会和集体

① Silver,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Marx, Karl, *Capital*, Volume I, Fowkes, Ben (trans.), Penguin Books, 1990.

③ 最重要的代表如：闻翔、周潇：《西方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批判性的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④ Thompson, Paul, *The Nature of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Debates on the Labour Process*,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pp. 242 - 245.

⑤ Braverman, H.,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1974.

⑥ Burawoy, M.,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⑦ Thompson, Paul, *The Nature of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Debates on the Labour Process*,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⑧ Edwards, R.,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asic Books, 1979.

⑨ 如布若维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生产的转移可能一方面威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构筑起来的霸权主义工厂政体（hegemonic regime），另一方面在具有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情境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多样化的生产政治形态，参见：Burawoy, M.,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Verso Books, 1985, p. 263.

谈判制度等在西方面临被架空的风险。<sup>①</sup>

当多元主义劳动关系学者忙于为如何重构“新政”以来一以贯之的制度逻辑建言献策时<sup>②</sup>，劳动过程理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传统，抛开仅作为改良主义技术手段的劳动关系制度性安排，抓住主要矛盾继续关注劳资阶级关系分析。以经典剩余价值理论的假设为前提，生产过程的数字化重构和资本为实现剩余价值的攫取所实施的劳动控制成为超越分配问题的核心研究问题。劳动过程理论重获对于工作场所层面诸多劳动关系问题的解释力。

在这些理论建构的基础之上，从劳动过程视角对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者的实证研究层出不穷。根据近期一项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文献计量研究，过去 20 年英文世界对于劳动过程的研究经历了从年均 20~40 篇（2003—2014 年）到年均 60~70 篇（2015—2018 年）再到年均 80~130 篇（2019—2022 年）的两次跨越式增长，这同 2015 年之后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全世界工作场所中的广泛应用是分不开的。同时，零工经济（gig economy）、算法管理（algorithmic management）等也成了新兴关键词。<sup>③</sup>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下的新就业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约车司机<sup>④</sup>、外卖骑手等职业群体的控制<sup>⑤</sup>以及工人对这种控制的反抗上<sup>⑥</sup>。劳动过程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影响力甚至得以拓展到管理学领域。亚历山大·甘迪尼的文章具有历史性意义，第一次系统阐释了劳动过程理论如何被应用于数字平台工作的研究之中。通过对基于平台的生产过程、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和控制的详细考察，作者认为，劳动过程理论提供了独特的工具，有助于我们理解以平台为中介的劳动过程是如何将劳动力商品化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用户反馈、平台工人的排名和评分系统如何被建构并用以管理和监控工人的行为。<sup>⑦</sup> 受到前述理查德·爱德华兹的启发，凯洛格等人认为数字平台就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新的劳资争夺地带（contested terrain）。嵌入在这一创新情景中的一方面是资本通过算法控制（algorithmic control）的技术手段扩大劳动力的价值创造，这种控制包含了六个重要机制（“6-R”），即通过约束（restricting）和建议（recommending）来指导工人，通过记录（recording）和打分（rating）来评价工人，以及通过替换（replacing）和奖励（rewarding）来规训工人。而另一

---

① De Stefano V, *The Rise of the Just-in-Time Workforce: On-demand Work, Crowdsourcing and Labour Protection in the Gig-economy*, Conditions of Work and Employment Series Working Paper No. 71. Geneva: ILO, 2016.

② 一个较全面的总结见：Stewart, Andrew, and Jim Stanford, “Regulating Work in the Gig Economy: What are the Options?”, *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2017, 28 (3): 420 - 437.

③ 张皓楠：《劳动过程理论评述与研究前沿分析：基于文献计量方法》，未发表文稿，2023 年。

④ Wu, Qingjun, Hao Zhang, Zhen Li, and Kai Liu, “Labor Control in the Gig Economy: Evidence from Uber in China”,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9, 61 (4): 574 - 596; 赵磊、韩玥：《跨越企业边界的科层控制——网约车平台的劳动力组织与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

⑤ Sun, Ping, Julie Yujie Chen and Uma Rani, “From Flexible Labour to ‘Sticky Labour’: a Tracking Study of Workers in the Food-delivery Platform Economy of China”,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Epub ahead of print 27 August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doi.org/10.1177/0950017021110215>; 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

⑥ Lei, Ya-Wen. “Delivering Solidarity: Platform Architecture and Collective Contention in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21, 86 (2), 279 - 309; Liu, Chuxuan, and Eli Friedman, “Resistance under the radar: Organization of Work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s Food Delivery Industry”, *The China Journal*, 2021, 86 (1): 68 - 89.

⑦ Gandini, Alessandro, “Labour Process Theory and the Gig Economy”, *Human Relations*, 2019, 72 (6): 1039 - 1056.

方面，工人持续不断地以个人或者集体的形式对算法控制进行反抗。而劳动过程理论的应用有益于揭示算法管理对工人可能产生的消极方面，同时关注工人的这类反抗形式。算法控制被认为代表了一种不同于社会化大生产模式下的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的新的控制模式<sup>①</sup>，在近年来成了工业社会学和管理学关注的一个焦点。

批判主义范式劳动关系研究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发展致力于拓展价值创造过程的空间边界。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代表着资本通过技术革新推动价值创造过程的新一轮技术升级，但是其本质仍然从属于阶级关系，沦为服务于资本主义剥削和阶级统治的工具。<sup>②</sup> 传播学进一步定义了数字资本主义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解释力的研究领域，包括新技术如何在时空范围内拓展资本主义的生产边界、协调并重塑生产过程，进而重构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sup>③</sup> 例如，数字技术打破了物理空间的局限，将一些传统服务行业（如外卖配送、出租车等）乃至本来未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非正规经济部门（如“黑车”司机、零散的家政服务人员等）的工作流程打破，再通过虚拟的数字平台链接整合，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实现了社会总福利的提高。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些技术红利中的绝大部分被资本攫取为剩余价值，而甚少由劳动者甚至消费者所分享。

更进一步，数字平台的用户，即消费者也被卷入到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来。这一理论流派最早可追溯到传播学对“受众劳动”（audience labor）的揭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价值攫取的过程不仅存在于生产过程和工作场所之中，剥削对象也不仅仅是薪资工人。<sup>④</sup> 这种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同 20 世纪 70 年代女权主义思想对家庭劳动不被认同为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的反思不谋而合。只是在那个时代，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平台尚未出现，“受众劳动”因此更多关注大众媒体受众，尤其是商业广告阅听人对资本积累和价值增殖的隐蔽的创造过程。

数字技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促使学术界重拾并发展了这一概念，并在传播学中催生了对“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的研究。传播学者倾向于对这一概念作宽泛定义，认为数字工作（digital work）包含了创造或使用数字媒体生产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类需求的一切活动。而数字劳动则是被异化了的数字工作，即劳动客体同其自身、同劳动者及其生产工具，以及同劳动产品相异化，从而劳动力被资本控制并服务于资本。<sup>⑤</sup> 这种宽泛的定义回避了对数字劳动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生产性劳动，以及是否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而不是一般价值）的讨论，从而避免了“受众劳动”视角此前在批判主义范式内部所遭遇到的类似批评。<sup>⑥</sup>

① Kellogg, Katherine C., Melissa A. Valentine, and Angele Christin, “Algorithms at Work: The New Contested Terrain of Control”,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20, 14 (1): 366 - 410.

②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传播与社会主义》，冯红译，《国外理论动态》2022 年第 5 期。

③ Fuchs, Christian & Vincent Mosco, Introduction: Marx is Back -The Importance of Marxist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day, In: Christian Fuchs & Vincent Mosco (eds.), *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5, pp. 1 - 21.

④ Smythe, Dallas W.,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7, 1 (3): 1 - 27.

⑤ Fuchs, Christian, Dallas Smythe and Digital Labor, In: Richard Maxwell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2017, pp. 51 - 62.

⑥ 参见 Lebowitz, Michael A., “Too Many Blindspots on the Media”,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1986, 21 (1): 165 - 173, 近期对于数字劳动领域针对相关问题讨论，参见胡莹、钟远鸣：《平台数字劳动是生产劳动吗——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的分析》，《经济学家》2022 年第 8 期。

无论如何，数字劳动的理论视角揭示了一个重要发现：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平台的消费者/用户同时作为数据的生产者，通过交易平台和社交媒体的使用、分享等正常消费行为而被卷入资本积累之中，为资本创造价值增值的过程。<sup>①</sup> 由于这类数字劳动常常是无酬工作，所以目前主流劳动关系研究对此的关注并不如前述平台劳动多，但在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则产出了一大批的实证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对于全球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金融化和数字化的变迁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抓住劳资阶级矛盾这一批判主义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深刻解构资本主义霸权和阶级妥协建立的宏观制度和微观组织和技术基础，而不受花样翻新的资本积累手段的迷惑，同时还能在迅速变迁的过程中抓住重构生产关系的机遇，因此得以重获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问题的解释力，持续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 三、有关中国劳动关系问题的思考与启示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全球化时代的全面来临使得批判主义和多元主义这两个劳动关系领域最重要的理论流派都遭遇系统性的挑战，促使两派学者们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各自的理论升级来应对挑战，以期重获对新时代一系列重要劳动关系问题的解释力——就像他们在过去的—个世纪里一直在做的那样。本文重点评述了批判主义范式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剩余价值理论及其后续在劳动关系研究领域的发展，并得出结论：与多元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所遭遇的瓶颈相比，批判主义范式凭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的洞察力而实现了成功的理论升级。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旧有的基于国家制度所构建的产业关系系统的式微使人们得以重新审视劳资阶级关系并在全球层面对其进行制度化重构，这一除旧布新的时刻恰恰赋予了批判主义难得的历史机遇，使历史唯物主义有望再次站在解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思想舞台的中心。而剩余价值理论也凭借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的深刻洞察力而在数字经济时代重获对资本主义社会契约和阶级妥协的微观基础的解释力。难怪布若维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自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如同一对双生子，资本主义的不亡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灭。<sup>②</sup>

批判主义理论范式的复兴有助于构建中国劳动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在全球治理和工作场所控制两个层面对学科内占据主流历史地位的多元主义范式进行系统性反思，从而在两个国家重大战略方向上为决策者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首先是在宏观层面助力我国直接参与国际治理体系，特别是全球劳动治理领域的改革和建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全球化历史进程加快推动了大量优秀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设厂。近年来，全球化迎来历史逆流，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体系遭遇挑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关系情境日趋复杂。总体来说，“逆全球化”代表着国家制度对资本前所未有的约束升级。一些国家的政府一面披着劳工保护的道德外衣，一面露骨地滥用“国家安全”的大棒在核心行业设置障碍，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全球价值链在半导体芯片等关键行业和地区的不确定性增强，乃至面临断裂威胁。这些新的变化给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全球化情境增加了变数和复杂性。对于批判主义来说，这种保守主义恐将国际层面破除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机遇重新困进国家主义的“牢笼”之内，但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抓住劳资阶级矛盾的主线，因此在对资本主义劳资阶级妥协的解释力上始终能做到游刃有余。

---

<sup>①</sup> Fuchs, Christian & Sebastian Sevignani, "What is Digital Labour? What is Digital Work? What's their Difference? And why do these Questions Matter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Tripla C*, 2013, 11 (2): 237 - 293.

<sup>②</sup> Burawoy, M., "Marxism as Science: Historical Challenges and Theoretical Grow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0, 55 (6): 775 - 793.

在全球劳动治理领域，国际标准、话语体系和游戏规则长期被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及其制度主义的政治议程所主导。以国际劳工标准为基础“社会条款”常常被置入国际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政治经济治理结构，以及 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欧投资协定等国际和区域性协约的规则体系之中，使本来致力于促进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的制度设计也被政治化，常常伴随保护主义的社会条款而为中国设置高准入门槛，影响并制约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步伐。

面向新时代和上述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内外场合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重申了中国人民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在发展中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坚定决心。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加快，中国政府、跨国企业，乃至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等雇主组织必将深刻卷入全球劳动治理体系之中，中国的产业关系系统升级成为全球产业关系系统中一个有机的子系统也将成为大势所趋。事实上，中国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当前已经以不同形式参与到劳动领域的国际合作当中，比如参与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常常伴有劳工条款的磋商）以及在国际劳工组织体制内参与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等。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亟待重构的背景下，我国预计需要越来越多熟悉全球劳动治理的人才，以及独立自主的全球劳动治理知识和理论体系，代表国家在劳动领域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国际治理，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在全球层面打破资本主义霸权，构建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体系和多极社会。而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必将愈发凸显其深刻的洞察力和优越性。

其次，在微观工作场所层面，剩余价值理论对劳资阶级关系的深刻揭示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民生保障等国家重大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平台就业正在全面变革以制度主义为基础所构建的国家主义劳动关系治理模式，进而系统挑战了多元主义的产业关系理论。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挑战的系统性和范式性，在近 10 年前平台经济崛起伊始的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最先感受到新就业形态冲击的正是多元主义者。然而，时至今日，许多多元主义者仍然为争论平台劳动者是否从属于某一种传统或者新型雇佣关系而不可开交——就像他们十年前所做的那样。反观批判主义范式，剩余价值理论及其后来所衍生出的劳动过程理论和数字劳动视角，从不同角度为揭示资本的创新劳动控制方式和更加隐蔽的剥削过程提供了重要的“透视镜”，为相关学术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也为突破旧有的思维局限，创造性地改革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收入分配制度提供了想象力。

总而言之，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中国，而中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实现也需要我们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更加主动而审慎地拥抱全球化及其所伴生的数字化和金融化历史进程。而这个全球化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而应该是一个被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之下的，谋求全人类命运共同发展和进步的全球化议程。

[责任编辑 陈翔云]

## The Revival of Criticism: A Review of Marxist Labor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Zhang Hao<sup>1</sup>, Yang Weiguo<sup>2</sup>

(1.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abor process theory; digital labor;

criticism; labor relations

[Abstract] The foundation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is the eradication of the ol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economic fiel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ld mode of production based on national border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multi-pola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andscap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liberaliz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hese changes have systematically challenged the relatively stable industry-labor relations established by the post-war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following the logical chain of “consumerism” - “Ford mass production” - “trade unionism” - “welfare states”. In the field of labor relations in the West, the mainstream pluralist theoretical paradigm has been therefore experiencing a difficult transformation. The critical paradigm with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as the core has ushered in a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y, and compared with pluralism, it has shown stronger explanatory power to the issues of labor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Specifically, along with the end of the post-war “Golden Age” of Western capitalism,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ts once again saw the hope of challenging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of capitalism on a global scale; the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regains its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arrangement of digital production through its deep insights into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digital labor. By reviewing the latest ideas of these two schools of thought,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theoretical community has been witnessing a revival of criticism in the debate on a series of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labor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bove theories in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body of knowledge on labor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explaining the issues of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